

《贞女传奇》的得与失

肖明翰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贞女传奇》在乔叟的创作发展和英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它是14世纪英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佳作之一,特别是其“引子”,既继承了宫廷爱情的诗歌传统,又进行了创新,使“爱情之园”成为喜剧性冲突的场所,实为当时英国文学所仅有。同时,诗人在“引子”里还表达了他注重现实的创作思想,这在英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意义。但《贞女传奇》是一部过渡性作品,表现出乔叟在转入新的创作方向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它的得与失在一定程度上为《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做了准备。另外,这是第一部用英雄对句写成的英语诗作,对这种诗歌体裁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

关键词: 乔叟;《贞女传奇》;宫廷爱情;英雄对句;《坎特伯雷故事》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6)01-0076-07

在乔叟现存7部长篇诗作中,《贞女传奇》(The Legend of Good Women)是一部比较特别的作品。它的特别并不主要在于它本身的艺术成就,而更在于它在乔叟的创作和英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首先,它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英雄对句(the heroic couplet)写成的诗作,因此开了这种重要的英诗体裁的先河。其次,它位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坎特伯雷故事》两座艺术丰碑之间,承前启后,是乔叟创作生涯中一部过渡性作品,它的形式,它的诗艺,它的成功,也许特别是它的失败之处,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做了准备。因此研究这部作品的成就和它的失误对于研究乔叟的创作思想,他的文学发展,以及《坎特伯雷故事》的辉煌成就都具有特殊意义。

关于《贞女传奇》的创作时间,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因为乔叟在作品中留下了一些线索。在大约完成于1386年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结尾,乔叟“恳求美丽的女士,和高贵的夫人”,不要

因为该书揭露了“克瑞西达的不忠/和罪孽而对我发怒”。他辩护说,克瑞西达的“罪孽”不是他的编造,女士们“可以从他人的书中读到”。他并且宣布:“我将很高兴大书特书……/珀涅罗珀的忠贞和阿尔刻提斯的高尚”[1](V. 1772—78)。乔叟的这种说法后来在《贞女传奇》的“引子”里被大力发挥,成为他创作那些传奇故事的原由。很明显,乔叟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创作快结束时,就已经在考虑写《贞女传奇》,而且从内容到主题思想都已经大体确定。另外,同样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结尾,乔叟还提到,希望上帝“赐他力量,在他死前,写出一些喜剧”[2](V. 1787—88)。学者们一般认为,这表明乔叟有了写作《坎特伯雷故事》的一些最初想法。《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大约于1387年开始,然而《贞女传奇》的“引子”所列出的乔叟的作品中并没有它的影子,人们据此认为,《贞女传奇》的创作开始于1386年《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完成之后,结束于1387年,也就是诗人全身心投

收稿日期:2005-08-17

作者简介:肖明翰(1951—),男,四川自贡人,俄亥大学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坎特伯雷故事》之前。

《贞女传奇》的精华显然在“引子”。在“引子”的500多诗行里,乔叟的思想和文学观,他丰富的想象力,他驾驭英语语言和英诗诗艺的能力,以及他特有的诙谐和幽默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引子”同《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一道被看作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精品。《贞女传奇》的“引子”有两个稿本,因其收藏地的编号而分别被称为“F本”和“G本”。关于这两个稿本的先后,学者们历来存有争议。直到20世纪初,经过弗罗斯的严密考证^[3](749—864页),现在专家们大体上取得一致意见,认为“F本”在前,而“G本”则是乔叟在1394—95年的修改本。其证据之一是,在“F本”里,阿尔刻提斯要求乔叟在“此书完成之际,请代表我,把它献给艾尔萨姆(Eltham)或希恩(Sheene)的王后”(F,496—97)。这里的王后是指理查德的王后安娜。作为宫廷文人,乔叟把一部歌颂古代女子忠于爱情的传奇故事献给王后,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安娜于1394年去世,理查德在极度悲痛之中,竟下令拆毁了安娜去世时所住的希恩王宫。因此在“G本”中,乔叟把这两行删去了。

当然,乔叟的修改远不止这一点。他对“引子”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节、增添和把一些段落提前。对于他的修改的得失,以及两个稿本的优劣,评论家们见仁见智。各种选本的编者,往往根据自己喜好,或选其中之一,或两者都选。总的来说,“F本”结构比较松散,前后照应方面也有欠妥之处,在结尾甚至忘掉了叙述者尚在梦中,就“立即开始我的传奇的创作”^[1](F,579)^①。经过修改,“G本”的“引子”结构紧凑,前后呼应,从整体上看,自然更胜一筹。另外乔叟还在爱神申斥他的那段话中增添了46行(G,268—313),责问他为什么放着那么多贞女节妇不写,却偏要去写克瑞西达,进一步加强了“引子”的喜剧性。但为了使结构紧凑,乔叟毅然割爱,也删去了一些十分优美的段落,使一些评论家深感遗憾。好在两个稿本都得以保存,而且许多选本都是将两个“引子”并列刊出,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欣赏。

有意思的是,“引子”一开始,叙述者就对眼见为实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人们应该/坚信不疑的事远多于亲眼所见”(G,10—11)。有许多东西,“由于没有其它方式可以验证,/我们就应该相信古

老的书籍”(G,27—28)。读到后来,我们知道,这部诗作里讲述的贞女们的传奇故事全都来自“古老的书籍”。从表面看,叙述者是在为后面的故事做铺垫,要我们相信它们真有其事。然而仔细一想,我们发现叙述者的论证不仅有些牵强,而且自身就已经暗含了颠覆其结论的因素。他实际上等于告诉我们,他所叙述的这些贞女的故事是现实中没有的,它们只存在于书本中。所以,乔叟让叙述者装得一本正经地要我们相信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暗暗地把它们的真实性给消解了。下面还将谈到,他对那些传奇故事的任意“改写”更是在艺术地消解它们的真实性。

尽管叙述者似乎在强调书本的权威和他如何喜爱书籍,但他实际上并非只沉浸在书里,而是经常关注并投身于现实生活。他在诗中尽情歌颂明媚的春光和雏菊的美丽,称雏菊为“白昼之眼”^②(F,185),“百花之后”(F,53;G,55),艳丽鲜嫩。乔叟对雏菊的优美描写是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绝唱,为历代所称颂。不仅如此,这里还暗含着书本和现实的比较,而这种比较表明,乔叟实际上是把现实和现实中的美放在书本之上,再一次表达了他曾在《声誉之宫》里系统地表达过的在文学创作中现实重于书本的思想^③。

同其他中世纪文学家一样,乔叟在创作中一直大量取材于古代和同时代欧洲作家的作品,因此如何处理书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把书本中获得的素材同现实结合在一起,是他在创作中十分注意解决的问题。不断增长的现实主义倾向是乔叟创作发展的核心,也是他能取得那样杰出成就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在《声誉之宫》、《百鸟议会》还是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或其它作品里,他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完美结合。然而在《贞女传奇》中,由于下面将讲到的原因,现实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问题。该诗“引子”的成功就在于它既源于深厚的文学传统,又植根于现实生活和乔叟本人的真实感受,而后面的故事的一个主要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全都来自书本,几乎都没有现实基础,违背了诗人历来遵循的创作原则。

在发表了对书本与现实的看法和批评了当时的文人和贵族们脱离生活现实、纠缠于毫无意义的争论之后,叙述者开始切入正题。爱神告诉叙述者,她

的确“已变成雏菊之神”(G, 500)。他们身后还跟随一群忠于爱情的贞女节妇。这个梦境显然属于宫廷爱情文学传统,使人想起《玫瑰传奇》,特别是乔叟本人的《公爵夫人颂》、《百鸟议会》和《声誉之宫》等作品。这表明,从1970年代初受意大利文学影响之后,虽经历1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乔叟并没有抛弃法国宫廷爱情传统中他认为有益的成分,而是将其融入自己的诗歌艺术。当然,他早已超越了简单模仿的阶段,能得心应手地改造传统形式来表达新的内容。乔叟这里对“爱情之园”的描写不仅特别美,更重要的是,他一改传统模式,把爱情之园变成了喜剧性冲突的场所。而这种喜剧性冲突将是《坎特伯雷故事》的突出特点。

当爱神及其艳丽的随行来到跟前,叙述者立即发现,他是不受欢迎的人。爱神竟然对他“怒目”相视,称他为“死敌”,严加斥责。叙述者吓得魂不附体,忙问是何缘故。原来乔叟翻译《玫瑰传奇》和写《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得罪了爱神。爱神说,《玫瑰传奇》是“违背我的教义的异端邪说”(G, 256),由于乔叟翻译了那东西,“致使聪明才俊离我而去”(G, 257)。更糟糕的是,乔叟竟然又写了一本“英语书”,揭露克瑞西达背弃特洛伊罗斯。他斥责说,自古以来有那么多贞女节妇,乔叟不予歌颂,却偏写克瑞西达的不忠,那是有意诽谤女子。爱神还指出,乔叟自己就有多达60部新旧书籍,里面记满了希腊、罗马女子的故事,她们那么高尚。他甚至以他母亲维纳斯的名义起誓,乔叟因“抛掉精华,专写糠粃”(G, 312),和其他“老糊涂虫一样/终将后悔不及”(G, 315—16)。

这时,“最高贵的王后”阿尔刻提斯连忙出面为乔叟辩护。她的辩护主要有两点:第一,爱神有可能是听信了谗言,乔叟被人诬陷;第二,乔叟“生性愚笨”,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他犯下过错,看来并非本意,因此罪名不应那么严重。不论是爱神的申斥,还是阿尔刻提斯的辩护,都充满喜剧性,表现了乔叟的幽默。特别有意思的是,阿尔刻提斯接下来发了一通几乎长达80行(G, 353—431)的议论。这通议论大体上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最长,达44行。她在这里充分发表对一个君王的品质看法。她认为,一个“公正的主子”不能像“伦巴底的暴君”那样专横暴戾,而应该宽宏大量,体恤臣民,注意民间疾苦,特别是对贫困百姓更要满怀同

情,并说这是数百年来君主们的庄严誓言。她还指出,一个君王应像高贵的雄狮那样轻轻摇动尾巴把蝇蚊赶开,而不能像饿狗或其它野兽那样为一些小事同下民斤斤计较,大打出手。对于阿尔刻提斯的这一段宏论,评论家们一般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认为那只不过是乔叟的文学戏言,通过女王用夸张的语言,恳求爱神对叙述者的过失宽宏大量而已。这段话确有这样的幽默,但乔叟花那么多笔墨,问题恐怕并不这么简单。实际上,乔叟也在利用戏谑场合,假话真说,发表他的肺腑之言。14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矛盾尖锐,1380年的农民大起义被镇压后,问题并没得到真正解决,下层民众的生活甚至更加困苦,乔叟对他们深为同情。另外,乔叟创作《贞女传奇》之时,英国政坛正波涛汹涌,以理查德为首的王党同以他叔叔格洛斯特为首的反对派的冲突愈演愈烈,乔叟自己也被波及,只得辞去海关职务,抽身而退。不论是从感情还是从利益上看,乔叟无疑都站在国王一边,但他清楚英国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对少年气盛的理查德二世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故意向反对派和国会表示轻蔑(比如把被国会弹劾的亲信加官晋爵,在乔叟看来,就明显是缺乏“雄狮的高贵品质”)的做法感到担心。他可能预感到,这样的冲突将带来严重后果。果然到了1390年代后期,理查德经过一段时间的退让后,大举反击,把反对派杀掉或流放,看来取得了胜利,然而却埋下了他1399年的悲剧的祸根。所以阿尔刻提斯的这番话决不仅仅是戏言,而是乔叟有感而发,且切中时弊,反映出他政治上的敏锐和洞察力。

随后,阿尔刻提斯话锋一转,列举出乔叟的作品,包括《公爵夫人颂》、《百鸟议会》、《声誉之宫》、《帕拉蒙与阿塞特》和其它一些不同类别的诗作,另外还有《哲学的慰藉》等译作。这是研究乔叟的创作生涯的十分珍贵的材料,受到学者们广泛重视。当然,阿尔刻提斯提出这些作品,是想表明乔叟为爱神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应该从轻发落。所以在第三部分里,她向爱神提出了对乔叟的“处罚”:要他写贞女节妇们的故事。

这时叙述者乔叟终于得到机会开口说话,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写克瑞西达,揭露虚情假意,并非背叛爱神,而“是为了推崇真爱珍惜深情”,因为他是把她作为负心和不忠的反面教材来警戒世人。爱神认为他诽谤女子,阿尔刻提斯则说他愚昧昏聩,不知

所云,而他则声明是为了推崇真情,谴责背信弃义。同一部作品,引出如此不同的观点,在世界文学史上,这也许是最早的“读者反应”批评,而且是一位诗人最早在诗作中有意识地运用艺术的形式来探讨自己作品的接受情况、来表现作者的创作目的同读者的解读之间的巨大差异等重要问题。

许多评论家指出,乔叟受此责备多半不是他凭空想象,而是反映了他的真实遭遇。他塑造了克瑞西达这个人物,很可能招来贵族妇女,包括安娜王后本人的责难^④。唐纳森还认为,阿尔刻提斯其实就是安娜王后的化身,也就是说,是安娜要乔叟写这些传奇故事,以弥补其“过失”。当然这只是推测,是否真有其事,那就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传统的宫廷爱情作品中,女主人公总是被塑造得冰清玉洁,高贵美丽,是爱情的化身,被骑士像女神一样顶礼膜拜。因此,深受宫廷爱情传统熏陶的中世纪贵妇们自然会对乔叟塑造出克瑞西达这样背叛爱情的“异类”大为不满,当然这种不满本身也带有一定宫廷游戏的成分在内。但从这也可以看出,乔叟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走到了历史的前面,已经远远超越了宫廷爱情诗的传统模式,所以遭到误解。前面提到,乔叟“恳求美丽的女士,和高贵的夫人”不要对他发怒,并宣布要“大书特书”“珀涅罗珀的忠贞和阿尔刻提斯的高尚”,这表明他已经预感到会招来责难^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贞女传奇》的“引子”就是对这段话的扩充和戏剧化,并用来说明创作这些传奇故事的原由。

叙述者并没有机会做更多解释,就被阿尔刻提斯打断,因为“不论对否,爱神都不会容许反诉”(G, 466—67)。王后吩咐他,自此以后,他应集中精力,专门传诵“节妇、贞女、贤妻”忠于爱情的“光辉事迹”和揭露“负心汉对她们的背弃”,并且要年复一年,到死方止。这就是对叙述者的过失的“轻微的处罚”,并得到了爱神的同意(G, 471—85)。这段话实际上把后面的传奇故事的内容和主题思想都做了交代。在这之前,那些跟随爱神和阿尔刻提斯的女士们所唱的一首颂诗已经提到包括阿尔刻提斯在内的19位古代著名的女子。爱神现在吩咐乔叟从埃及艳后克勒帕特拉写起,先写次要的女子,最后歌颂这位至善至美的阿尔刻提斯,也就是说,这些故事将在结尾处达到高潮。叙述者这时从梦中醒来,立即着手写那些奇女子的故事。《贞女传奇》的“引

子”也在这里结束。这个引子写得妙趣横生,特别精彩。其实乔叟所有长篇作品里的引言都写得特别美,这可能是因为引子里,他的想象力不受约束,能自由发挥的原因。

很明显,乔叟本打算讲述19位女子的事迹,然而在第9个故事的结尾,他正打算告诉读者该故事的主旨:“这个故事是要说明——”(F, 2723),竟嘎然而止,总共只讲了10个女子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有两个女主人公),使这部诗作同他的大多数长篇一样,没能最终完成,大约只是原计划的一半。

这部传奇故事里,所有的女子都生活在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其事迹大多取材于奥维德,乔叟另外也参考了维吉尔和薄迦丘等古今诗人的作品。前面说过,乔叟一直喜欢把古典故事作为创作素材。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杰作中,他能充分发挥想象力,把古代素材和英国的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作品。然而在这些贞女节妇的故事里,诗人的想象力却大受束缚。

首先,这里几乎没有英国现实社会的影子,乔叟所特有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用武之地。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故事的创作是主题思想先行。阿尔刻提斯和爱神在“引子”里已经把它们的内容和主题思想做了规定,这实际上等于为它们定下了基本模式。这种预定模式的做法直接有悖于乔叟一贯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因此诗人的想象力得不到自由发挥。在已经写出的9个故事中,大多数的基本情节都是某女子如何为爱情牺牲了一切,却被负心甚至邪恶的男子所抛弃,对爱情的忠实几乎是她唯一的美德,而且她的遭遇越是无情,越是悲惨,她的“美德”似乎也就越突出。这样的写作似乎越来越成为乔叟的负担(恐怕真如阿尔刻提斯所说,是对他的“处罚”),因此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那些表明他想长话短说甚至急于想结束故事的句子或短语,几乎随处可见。

当然也不是说,这些故事一无是处。乔叟毕竟是乔叟,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英国并不多见,而且在有些故事里,特别是在那几个较长的故事里,也颇有一些很优美、很吸引人的部分。不仅如此,近期研究还发现,尽管这些故事几乎是一个模式,但它们并非像表面看来那样简单。在“引子”里,叙述者信誓旦旦,要客观陈述故事(naked text),然而他所讲述的故事一点也不“客观”。不少当代评论家认为,这些

故事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讽刺性。至于它们是对妇女、对爱神(即批评乔叟诽谤妇女的人)或者是对宫廷爱情传统的讽刺,评论家们则见仁见智[4](204页)。这种讽刺性解读最有力的根据是,在这些古代女子中,许多人在历史上大有争议,并非都值得歌颂。特别是埃及艳后克勒帕特拉,在中世纪人看来,简直是臭名昭著。当然,她投靠罗马强势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埃及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把这样一个女人歌颂为使“虚情假意”的男人们羞愧的“贞洁”典范(F, 666—68),恐怕不无讽刺之意。在乔叟的故事里,不仅所有不利于克勒帕特拉名声的事都被一律隐去,而且她还成了安东尼的合法妻子。即使在中世纪,克勒帕特拉的事迹对许多人也并不陌生,而乔叟竟然宁肯“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也不选择其他女子,恐怕很难说是在真心实意地歌颂“贞女”。正如马丁所指出,对历史上的克勒帕特拉的事迹知道与否,将严重影响人们对这个故事的解读,使他们得出完全不同结论。他认为,乔叟的做法不禁使人觉得,“要想塑造一个‘贞女节妇’就得将与其形象相悖的一切全都抹去”[4](205页)。这也许正是乔叟对当时基督教宣扬的妇道观的巧妙讽刺。特别有意思的是,叙述者是遵爱神之命,才把这个名声比克瑞西达更为糟糕的女人放在所有贞女之前,那更是莫大讽刺。另外,如同乔叟在《声誉之宫》里所做的那样,这个故事也因此揭示了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和声誉的任意性,直接呼应了“引子”的开篇对书本的可信性和真实性的解构。

这样“随意”删节或改写“历史”,在后面的故事里也时有发生。所以这部诗作的确具有讽刺性,这种讽刺性解读或许可以揭示作品的深层意义,但却不能使这些传奇故事成为艺术上的杰作,因为这些故事不论在人物塑造还是在情节安排方面都不太具特色。乔叟能及时放弃《贞女传奇》,转向《坎特伯雷故事》,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这部将最终奠定英国文学传统的杰作上,不论对他本人的成就还是对英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一大幸事。如果说《贞女传奇》本身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它的创作经验,它的得失对于《坎特伯雷故事》却十分有益。不论《贞女传奇》和《坎特伯雷故事》在内容、思想主题、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差别多大,前者的写作实践在正反两个方面都为后者的创作做了准备。其实,它们之间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并存在明显的延续

性。可以说,《坎特伯雷故事》是乔叟正确总结了《贞女传奇》的得失之后在他的艺术创作道路上符合逻辑的发展。

在这之前,乔叟文学创作的顶峰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那是一部以高雅体裁写成的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叙事诗,是中世纪宫廷爱情(courtly love)传统的浪漫传奇文学在英国的最高成就。虽然诗中的特洛伊明显更像乔叟时代的伦敦,但不论在主题、内容、思想还是体裁、风格、语言等各方面,它都与《坎特伯雷故事》这部用高度发展的叙事框架把大量故事整合在一起全方位表现中世纪英国社会并同时进行深入的精神探索的作品大为不同。《贞女传奇》可以说是它们之间的过渡性作品。它是乔叟第一次尝试创作短篇故事集^⑥,并尝试为故事集提供一个叙事框架,这是乔叟创作道路上一个极大的转折和发展。但《贞女传奇》里的“引子”和那些故事在艺术上的反差表明,乔叟对短篇故事的创作还不能得心应手,还不能在这种体裁中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和讲述精彩的故事,它完全没有《坎特伯雷故事》里那种被英国第一位正式受封的桂冠诗人德莱顿(Dryden)所赞叹的“上帝的丰富多彩”(God's plenty)。另外,作为叙事框架的引子虽然为后面的故事规定了人物、内容和主题思想,但它远没有像《坎特伯雷故事》里的叙事框架那样把这些故事在结构上建构成有机的艺术整体。但最失败的是,正是为了把引子建构成叙事框架,乔叟竟然为后面的故事预定了模式,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这也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乔叟肯定很快发现,根本症结就是主题思想领先和预定故事模式。如果不是受束于预定模式,而是让想象力自由发挥,如果不是局限于书中的记载,而是把创作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那么短篇故事这种灵活多变的艺术形式就能使乔叟所特有的那种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大有用武之地。从本质上看,乔叟是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具有创造性的诗人,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作品里,他已经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天才。但他这种丰富、多元、不能受束缚的散发性想象力要到《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中才会发挥到极限。这正是《坎特伯雷故事》之所以能取得那样杰出的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乔叟没有预设任何模式或限定,而是最大限度地开放他的诗作,高度发挥他

的想象力,从而创作出从思想内容到题材和体裁都丰富多彩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和塑造出一大批栩栩如生、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同时他还将朝圣旅程建构成具有内在联系、高度发展的叙事框架,从而把那些独立成篇各具价值的故事建构成艺术上的有机整体。如果没有《贞女传奇》的先期实验,没有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基础,《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有可能受到影响。前面讲过,乔叟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结尾提及他打算写一些“喜剧”,表明他已经萌发了创作《坎特伯雷故事》的想法。所幸的是,乔叟并没有立即着手,而是先拿《贞女传奇》来“练笔”,否则《坎特伯雷故事》的成就可能会大打折扣。

如果说在思想内容和故事情节方面,《贞女传奇》具有一些“先天不足”的缺陷的话,那么在英诗诗艺上,它却是一部少有的杰作。在这部作品里,乔叟的诗艺和他对英语语言的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贞女传奇》还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英雄对句写成的长篇诗作。这种以五步抑扬格诗行为基础、对仗工稳的双行同韵对偶句是乔叟后来最喜爱的诗体之一,《坎特伯雷故事》里的大多数故事都使用这种诗体。所以在诗艺上,《贞女传奇》实

际上也为《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做了准备。不仅如此,英雄对句后来还成为英诗的主要诗体之一。由于这种诗句读起来节奏感很强,而且工稳和谐,十分符合新古典主义的理念,所以特别为理性时代的诗人们所喜爱,成为18世纪最常用的诗体。

乔叟能取得辉煌的成就,成为英语文学之父,决非偶然。他是一个十分善于学习的文学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从各种传统中广泛吸取艺术营养并因此而积累起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手法,同时他也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学习,吸取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在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方向,实验新的诗歌形式和手法,发展自己的创作思想。可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既是对过去的继承,也是一次新的尝试。《贞女传奇》尤其如此。它处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坎特伯雷故事》两部十分不同的文学杰作之间,它既根源于深厚的文学传统,也表现出乔叟敢于创新的勇气,但也反映出他在创作发展道路上转向新的方向时出现的一些问题^⑦。正因为乔叟善于学习,敢于创新,并能迅速总结《贞女传奇》的创作中的得与失,他才能最终创作出饮誉世界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

注释:

- ①本文对《贞女传奇》的引用都出自Robinson版本[1],下面引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诗行,F/G表示稿本,随文注出,不再加注。
- ②在中古英语里,雏菊拼写为dayesyes,即day's eye,乔叟称之为“ye of day”。
- ③关于乔叟在《声誉之宫》里如何系统表达文学创作应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观点,可参看拙文《〈声誉之宫〉:乔叟对诗歌创作的探索》,《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 ④比如著名乔叟专家唐纳森就持此说。参看E. T. Donaldson, “Commentary,” in Donaldson, ed., *Chaucer's Poetry*, 2ed.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5), p. 1121.
- ⑤当然也有可能,在全书完成之前,《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些章节已经在流传,或者说已经在宫中朗诵过,所以贵妇人们已经表达了她们的不满。
- ⑥乔叟在70年代创作的《修道士的故事》里的“故事”,都过于短小,其中大多数要么没有情节,要么情节太简单,它们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用来支持乔叟的悲剧思想的事例。
- ⑦有许多评论家认为,在乔叟的创作道路上,他这时正处于从所谓“意大利时期”发展到“英国时期”的转型期。

参考文献:

- [1] Chaucer, Geoffrey.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in F. N. Robin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
- [2] Chaucer, Geoffrey. *Troilus and Criseyde*. in E. T. Donaldson, ed. *Chaucer's Poetry*, 2nd ed.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5.
- [3] Lowes, John Livingstone. “The Prologue to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Considered in Its Chronological Relations.” *PMLA*, 1905, (20).
- [4] Martin, Priscilla. *Chaucer's Women: Nuns, Wives, and Amazons*. Iowa City: Univ. of Iowa Press, 1990.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Achievements and Defects

XIAO Ming-ha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has its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Chaucer's writing career an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t is one of the valuable English works in the 14th century and, especially, its "Prologue" both inherits the courtly love poetry tradition and transcends it, turning the "garden of love" into a place of comic conflicts, which is absent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Chaucer also expresses his realist views in it. But the poem is also a transitional work with some defects. However both its achievements and defects to some extent prepare for *Canterbury Tales*. Besides, it is the first English poem of the heroic couplets and h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is poetic form in its lat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aucer;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courtly love; heroic couplet; *Canterbury Tales*

[责任编辑:张思武]

● 书 讯

张邦炜教授《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出版

继《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出版之后,我校历史系张邦炜教授的又一本个人论文选集《宋代政治文化史论》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于2005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凡41万字,收入论文27篇,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由《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等7篇论文组成,重点在于宋代中枢权力研究。作者提出并论证了宋代政治实可称为士大夫政治,宋代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宋代大体无内朝、基本无内乱等颇有新意,且有份量的重要论点。第二部分:北宋晚期政治研究,由《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等6篇论文组成。作者认为,北宋并非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腐败亡国。北宋晚期之所以腐败,是由于北宋开国以来所形成的权力制约体系全面崩溃,皇权以及内朝、外朝的权力一概恶性膨胀。从总体上说,北宋亡国不是因为死守祖宗家法,反倒是放弃作为祖宗家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力制约体系所致。第三部分:宋代历史人物研究,由《澶渊之功数第三——北宋枢相王继英事迹述略》等5篇论文组成。作者就毕士安、寇準、王继英、宋孝宗、范成大、韩侂胄等重要历史人物和澶渊之盟、开禧北伐、吴曦叛宋等重大历史事件陈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独到见解。第四部分:宋代文化教育研究,由《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等5篇论文组成。作者指出,文化相对普及是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广开来学之路”是宋代教育最富有时代意义的变化,“取士不问家世”是宋代科举制度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发展。第五部分:宋代丧葬习俗研究,由《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等4篇论文组成,既论述宋辖汉族居住区,又涉及契丹、党项、女真、大理及宋辖少数民族居住区。在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各种丧葬习俗中,火葬的盛行尤其值得重视。不仅汉族如此,契丹、党项、女真、吐蕃、乌蛮、末些蛮等少数民族也如此。作者认为,这一时期之所以成为我国历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各民族之间丧葬习俗的相互交流是重要原因。全书征引广博,论证严谨,文笔流畅,自出版以来,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张翠方、李联聪)